

◀ (上接12版)

是“修改增作自序三千言”。17日是“修改”，18日是“略改”。4月19日又是“修改增作自序廿余页”。4月20日是“修改增作自序十余页，毕”。

可以看到，顾氏在16日、19日和20日（也即影印手稿的三个落款日期）对文稿的处理，在《日记》中都用“修改增作”这样特殊字眼来记载；每次“修改增作”的结果，都会相应调整落款。与《日记》相联系，上举关于时间层次的第一图(图5)所示，是16日“修改增作”的结果，估计在这次“修改增作”之前，应当有一页的落款日期是“4月10日”，由于改作而废弃。第二图(图6)所示的红色方框，就是19日“修改增作”的标志，几乎可以确定右侧红色方框中的文字就是19日当天加上去的。第三图(图7)所示紫色方框，就是20日“修改增作”的标志。

初步打捞梳理《日记》的“过程记述”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。1月12日开始写初稿，但大约一星期即收束。2月22日星期一（正月初十），“作《古史辨》自序三千余言（第二次稿）”。现在影印出来的手稿，其基底就是所谓“第二次稿”，顾氏后来的写作、修改，都是循此延续与展开。这次重新开头后，工作了约两个星期，顾氏在3月6日总结此前两度的工作，说：“古史辨自序，一月中起初稿，并集材料，约费一星期。近两星期中作二稿，每星期可得五日，上星期作两万字，本星期作一万字。此为予生平第一长文。”这次作文，到3月8日又暂告一段落，此后他整。3月18日晚，顾氏的红颜知己谭慕愚“将所草序文看毕”，第二天顾颉刚又重启了写作工作，这次没有另起一稿。此后就是写作与修改的穿插进行，大约3月24日以前是“作”，从25日开始“改”，此后也间有“作”。然后就是上文提到的4月10日的“草自序三千余言（初稿毕）”（按这里的“初稿”其实是“第二次稿”的不同说法），以及后续的修改与“修改增作”。22日“草毕”之后，顾氏还有看排稿与清样的记载，当然对文本又有所修订，尽管体现不在影印稿本上，但可以通过对比出版物与手稿以显其迹象。

既然一方面有《顾颉刚日记》中有关《自序》写作的“过程性”记载，另一方面还有影印手稿与最终排印文字这两份“产物性”的文本（手稿上的修改也有“过程性”），那么我们就有一定的条件，能够为《古史辨自序》中的文字或“文字群”赋予时间的维度，做出时间层次的大致分析。笔者的上述“手稿学”探索，

极为初步。要想进一步细化，顾氏《日记》述及写作与修改工作，多有“若干千字”、“若干页”的量化记载，也许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数字联系到手稿上去，尝试进行细数与爬梳。

二

由上一节我们已经见识到了《顾颉刚日记》纪事之详明有法——手稿上落款的动作，在《日记》中都有特殊的用词记载。现在我们从《日记》上另一则关于书写文件的记载说起。

1935年5月12日，是一个星期日，顾颉刚进城，有“到书社，写适之先生信”的纪事。找寻《顾颉刚书信集》中顾颉刚致胡适的信，没有系于这一天的。幸运的是，这封信没有佚失，目前正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藏书的其中一册里。这封信的“集外之信”的性质是笔者发现的。它的日期的考定，是郭永秉老师启发笔者的。现在将它公开，则是受到北大图书馆特藏部邹新明老师的授权与允可。下面详述原委。

2016年9月，北大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。为庆祝此事，举办了名为“胡适与北大”的专题展览。笔者参观时，得见展品中有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两页书信原件。当时检查《顾颉刚书信集》，发现是一封佚信(图8)。

笔者再将行书作释文如下：适之先生：

兹将闻宥先生所作《字喃》一文奉上，此文，东洋学报曾介绍过，称为日本人尚未研究过的问题。又其可担任之课，另纸录上，未知有可备择取者否？

王同春一文，奉上。先生近来提倡传记文学，我很想把这人的行事继续搜求，写成一篇比较可读的传记。未知应如何写法？乞给我一个指导。

又浦江清君向绍虞介绍徐声越君，闻此人确甚好，惜因燕京同人与外界太不接触，故不敢请他方学者，必在先前曾在燕京授课中人选择，以致未能推荐成功。如先生有意用他，当嘱浦君将徐君著作奉上。

学生顾颉刚上。十二日 这封信的内容，具有应酬色彩，目的也十分明确：一是向胡适推荐闻宥，二是呈上自己的“王同春一文”请教，三是代浦江清向胡适推荐徐震罅。

关于这封信，邹新明老师又惠赐两项重要信息。首先是这两页书信夹在胡适藏书的闻宥《论字喃(Chu Nom)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》抽印本中，抽印本有闻宥题记：“适之先生教正，闻宥上。”现从这封信来看，胡适藏书中的这一抽印本，就是顾氏信

中所言“奉上”的“《字喃》一文”，其来历是闻宥为了谋职转托顾颉刚献给胡适的。

邹老师还提供了特藏部关于此封书信的考证：“顾颉刚致胡适。信末仅署‘十二日’。信中所提‘王同春一文’，即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，先后发表于1934年末《大公报》的《史地周刊》和1935年的《禹贡》杂志，故此信大致写于1935年前后。”这就涉及书信写作时间的问题，如果尝试精准确定写信日期，还应当参考《顾颉刚日记》。笔者曾继续沿着“王同春一文”的线索，并引据《禹贡半月刊》上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(改稿)》“前记”所述的修改过程，联系《日记》中写作此文的时间记载，把此信写作时间定在了1935年1月12日。顾氏随信呈上的“王同春一文”，初以为是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的《初稿》；言“乞给我一个指导”，表明顾氏希望胡适能像后来《改稿》“前记”中提到的吴文藻、张星烺、赵泉澄等学者帮助顾氏充实材料一样予以写作上的援助(《改稿》于同月27日写成)。虽然当日《日记》没有“致胡适书”这样的记载，本以为这可以说得过去。不过笔者也从信中为闻宥谋事的内容联系到闻氏去向的问题，据查闻氏1935年夏天离开北平，所以把这封信理解为年初为之求情。

与郭永秉老师交流之后，他怀疑闻氏夏天离开北平，年初求情也许太早。他提示笔者检查下面几个12日的《日记》。虽然顾氏写完王同春传记《改稿》两天后就回南方，一直到5月2日才返校。但5月12日确实有“到书社，写适之先生信”的记载。这当然是考定书信时间的最有力证据。那么，我之前猜测的顾氏为王同春传记《初稿》求助于胡适，也是本无其事了。《日记》显示，5月上中旬，胡颉走动频繁，不止顾氏多次进城拜访，胡适也在5月9日、16日、23日三个星期四光临西郊燕京大学讲演中国哲学史。5、6月间，顾氏常有为推荐人才这样的事务而写信求助胡适的事例，涉及人物除了本信提到的闻宥和徐震罅，还有周一

良、杨向奎、高去寻等人。顾氏写完这封5月12日的书信，13日下午“到在宥处”，估计也是谈去留问题。

这封信能够以正确的时间坐标，面世以饕同好，需要在此敬向郭永秉老师和邹新明老师表示十分的谢意。

此外，笔者还留意到一封未收于《书信集》但先已发表在别的报章上的顾氏致红学家吴世昌的信(《书信集》本无“致吴世昌”条目)。吴世昌将其节录作为《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“伪”谬论》一文的附录，初次发表于香港《七十年代》杂志1979年第9期，后收入吴世昌1980年文集《红楼梦探源外编》。先把文字转引如下：

子臧我兄：

四月中奉上一函，即承将杨译本红楼梦一部见赠，又蒙将港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及尊著关于石头记论文(自订本)等书见借，不胜感荷。

我想写的一篇论文，为《由于脂砚斋的封建思想而破坏了曹雪芹的写作技术》，兄以为如何？写成后当先奉正也。

雪芹题《琵琶行传奇》一律，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，亦当秉此旨意，写一短篇。届时请赐正！……问好！

顾颉刚 一九七九，七，十八 内中除去括号里的“自订本”三个字是吴世昌的注释，以及被省略略去的内容，剩下的都是顾氏笔墨。顾颉刚同吴世昌，1930年代就在燕京大学以师生之谊熟识，1962年吴世昌辞去牛津教席回国入职文学所，与顾氏同属科学院，“文革”之后的劫后余生，两人来往也愈见密切。另外，信中提到的“港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”，即1961年影印的胡适收藏的石头记甲戌本。

吴世昌意图引用这封顾氏书信的最关键内容，即“雪芹题《琵琶行传奇》一律，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”，同一出1970年代末上演的被称为“红学界水门事件”的学术闹剧相牵扯。沈治钧先生《红楼七宗案》之《关于“曹雪芹佚诗”案》有极为彻底的调查研究。其案情概况是，众所周

知曹雪芹诗作遗文只有“白傅诗灵应喜甚，定教蛮素鬼排场”一联，本是曹雪芹观脚本《琵琶行传奇》后题咏的律诗中为其好友敦诚所记录下的两句。所谓“雪芹题《琵琶行传奇》一律”，是周汝昌1970年代初自己试补六句凑成的全诗。但周汝昌已有试图蒙混为真的不净居心，渐渐传给各方学者以试探风声，差一点发表在《文物》1973年第2期的《〈红楼梦〉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》中。吴世昌早从吴恩裕处知道此诗，又在审稿时注意及之，信以为真，以为奇货可居，且因平日与周汝昌有隙，看不惯他所理解的周汝昌“隐匿材料”的行径，于是1974年与上海徐恭时先生联名撰文疏证此诗，进行“认真”工作。自1977年开始，有正式出版的文章指出这诗前六句不是雪芹手笔，而且“辨伪”声浪越来越大。吴世昌怀疑这是周汝昌怨恨自己抢先发表而在背后制造流言、推动炮制文章以强把“真”的说成“假”的，于是只好披挂上阵背水一战，一再坚持说是“真”的，将周汝昌的军，向事实上“造假”之人求“实证”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这便是“红学界”貌似“疑案”的一出糊涂“骗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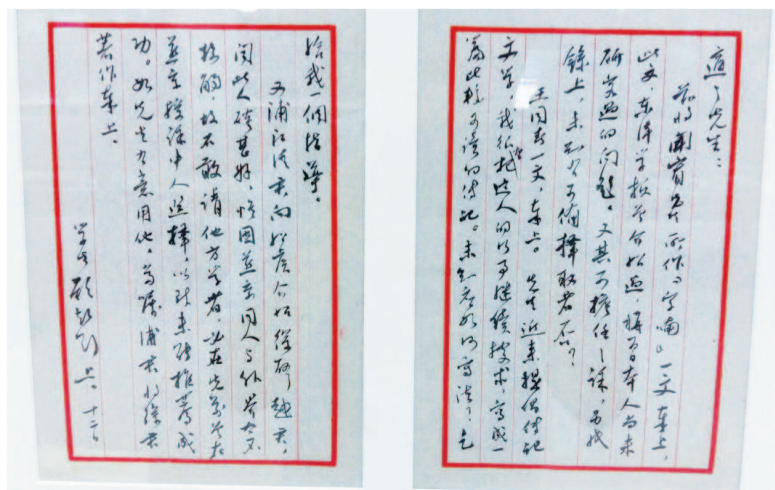
顾颉刚的书信就是在这个当口被吴世昌拉来助阵的，其时吴世昌正在与香港的梅节打笔仗。顾颉刚是以“辨伪”负盛名的大宗师，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培养了对“文物”工作特别的信任之情。

三

顾氏平日的记事习惯既如此务求详尽，我们看台湾及大陆出版的《日记》已觉是“无尽藏”一般。其实在已出版的《日记》之外，还有两条未见出版的日记内容，载于顾颉刚《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》一文。兹引如下：

蔡子民先生来长吾校，锐意图新，将以农、工、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，大学本干，独留文、理、法三科，文科在沙滩，

(下转14版) ▶



(图8)2016年9月“胡适与北大”专题展览上展出的顾颉刚致胡适的一通两页书信原件。季琳超摄